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三九期 ——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002c)

【文革公案】	刘复之谈公安部长李震自杀事件	钟名一
【人物追踪】	鬼使神差的日子——顾准逝世三十五周年祭	朱学勤
【文革一页】	鲁瑛是怎样从上海到北京的	钱 江
【知情者言】	在钓鱼台的日子	阎长贵 • 向继东
【读史札记】	读《丁盛将军回忆录》有感：丁盛到底冤不冤？	倪庆峰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七）	舒 云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文革公案】

刘复之谈公安部长李震自杀事件

• 钟名一 •

“文化大革命”期间，1973年10月21日，发生了公安部核心小组组长、革命委员会主任（对外称部长）李震自杀事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1974年1月，破案组确定李震是自杀而死。但因为种种原因，直到1977年3月，经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报告，中央批准了破案组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这一案件才算是尘埃落定。

刘复之，延安时期曾先后任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的秘书，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公安部门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受冲击。“文化大革命”后历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司法部部长、公安部部长、武警第一政委、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他是李震自杀事件的重要当事人，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受牵连关押一年多。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介绍了自己在这件事情中的亲身经历，并谈了自己的看法。

◇ 李震自杀之谜

李震，1938年参加革命，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工作而被授予少将军衔的10人之一。1966年9月3日，李震由沈阳军区副政委的任上调公安部任常务副部长，实际主持公安部的日常工作，当时谢富治兼任部长。1970年谢富治得癌症治疗，李震即任公安部核心小组组长、部革命委员会主任（对外称部长）。

1973年10月21日夜，李震吊死在公安部机关大院地下热力管道沟内。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形势紧张。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分析案情后，认为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因此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委托华国锋负责破案工作，纪登奎、吴德协助，同时在公安部内进行动员整顿工作。11月11日，正在中央举办的“读书班”学习的祝家耀（十届中央委员）、杨贵（十届中央候补委员）被派到公安部工作，任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也参与破案工作。

1974年1月，经侦查人员大量调查研究，解剖尸体化验，现场痕迹检验，以及各种方式的模拟试验，完全证明李震是自杀而死。

李震为什么自杀？众说纷纭，至今各种说法都有。李震的女儿李豆豆，前几年找了公安部的许多老人，想了解李震之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什么自杀的。她也找到了刘复之，刘复之让她去找华国锋和汪东兴了解情况，他们当年负责这个案子，当时最知情，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结果。

刘复之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也谈到李震自杀的原因。

他首先否定了一种当时非常流行的看法——李震自杀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安部“算旧账”与反“算旧账”的矛盾始终无法解决。

公安部“算旧账”与反“算旧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得从九一三事件后批林整风运动说起。九一三事件后，公安部在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罪行的同时，多次召开核心小组会议和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听取干部群众对这几年工作的意见。

在核心小组会上，公安部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于桑首先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方法有意见，说：“我今天有意见，以后还是有意见的。”在公安部全体职工大会上，于桑又说：“钟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动员大家把意见说出来。经过发扬民主，群众提出的意见主要有：“砸烂公检法”，下放五七战校（当年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标新立异的做法，全国都叫五七干校，唯独公安部叫五七战校），党的优良传统被破坏，社会治安方面发案率高，破案率低等。另外，对于“伪党”一案造成的恶劣影响，向李震、曾威（公安部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提了许多意见。

为此，李震对过去的工作做了检讨，并把检讨和部里“批林整风”情况写成简报，上报国务院。纪登奎看了简报后，把李震找去。李震回来在核心小组中传达了纪登奎的批评：“别的简报我不看，你公安部长检讨的简报我不能不看。你们公安部发生了‘算旧账’的苗头，带了一个不好的头……对各省、市公安厅、局会有影响的。”

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任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提法都是不能允许的。这样，公安部从核心小组到广大干部职工中产生了“算旧账”和反“算旧账”两种意见，实际上是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分歧和争论。一部分人认为“算旧账”是于桑、刘复之带头引起的，批评他们有“傲气”、“怨气”、“不服气”三气，而另一部分干部则不同意纪登奎的批评。

关于“算旧账”问题的争论，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了公安部核心小组中矛盾的焦点，无论中央领导怎样批评，也无法使问题得到真正解决。遵照周总理指示，应该统一思想，统一思想后写报告报国务院。但报告拖了很长时间定不了稿，最终流产。

刘复之说，李震比我和于桑都大一岁，社会经验很丰富。李震自杀，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谁也没有想到。这也与“文化大革命”“算旧账”联系不上。从中央来看，公安部的争论是个问题，但不会促成李震自杀。“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家都“左”，这种争论怎么会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呢？李震是1973年10月21日晚上午夜自杀的，我知道这事是22日。而“算旧账”的争论发生在1972年11月，中间隔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因此争论不会促使李震自杀。

刘复之接着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被冲击，直到1971年才从黑龙江“解放”回公安部工作，继续担任副部长，同李震接触不少，总感觉到李震精神很紧张。这和他最终自杀可能有关系。

刘复之就此回忆了两件事。一件事，叶剑英有一次请一位高级民主人士吃饭，看电影。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刘传新派人盯梢，后来这件事不知怎么传了出去。叶帅办公室往公安部打电话来问，说叶帅请的客人有什么问题吗？把李震弄得很紧张，让刘复之打电话查问一下，一问是北京市公安局搞错了，是个误会。李震带上刘复之上叶帅家去道歉，去了叶帅家也就待了20多分钟，叶帅哈哈一笑，说是个误会，不必介意了。当时规定，坐吉姆车以上的人不能盯梢，“文化大革命”乱了，这规矩也被破坏了。事情过去也就算了，叶帅也没在意，阴差阳错下面干的，但李震依然很紧张。回来的路上，李震对刘复之说，唉呀，要掉脑袋。刘复之说，不至于吧，没有那么严重。另一件事，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每人桌上放了一张纸、一支笔。李震当时不知在想些什么，信手在白纸上乱涂乱画。服务人员看到后感到很奇怪，问是怎么回事，又是刘复之给打的圆场，说他神经紧张，没什么事。

◇ 受牵连遭审查

李震出事以后，公安部立即上报了中央。但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又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

10月22日当晚，于桑从国务院回来召集核心小组开会，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于桑、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杨俊生（北京卫戍区政委）、杨德中（八三四一部队政委、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刘传新等组成破案组，从外地调来几名法医，着手破案。

23日晚7时左右，周总理把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找到国务院会议室，要他们谈各自的看法。在这次会上，周总理指定破案组由华国锋领导，张其瑞（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参加破案组，同时增加了郭玉峰（中组部部长）、田维新（总政治部副主任）；指示公安部核心小组要同心协力配合破案组工作，主要是部内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在破李震自杀案的过程中，公安系统有一场斗争，有些人认为以于桑、刘复之为首的人要搞复辟，算“文化大革命”的旧账，把李震杀掉，是要夺权。凡是肯定十七年公安工作成绩，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反对“公安六条”的，都被列为审查对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

于是，很快发生了于桑、刘复之被保护审查的事情。26日下午，郭玉峰、田维新通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开会。郭玉峰、田维新同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

一起前往人民大会堂。进了人民大会堂前厅大门，于桑走在前面。突然，守候在这里的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上前一左一右把于桑架走了，随后刘复之也被架走了。

刘复之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详细回忆了上述这段亲身经历——

我经历过很多事情，经历过多次党内斗争，但要抓自己还是没有想到。

李震死后，中央指定施义之负责公安部工作。22日我在公安部礼堂东边的小会议室去看了，李震遗体摆在那里。有人当时就说是自杀，有人背后说自杀。搞公安的都有经验，上吊自杀的征状很明显，舌头伸出来了，绳子勒脖子的痕迹中间深，往两边逐渐浅下去。我当时的心情很惊讶，也很沉重，根本没有高兴得怎么样。我与李震关系还是不错的，1971年从五七战校回部里与李震共事好几年。李震对我还是很客气、很尊重，让我分管业务，于桑分管警卫和外事，工作上的矛盾不会促使他自杀。

当时中央通知10月26日开会，大家都等着。等到26日晚快12点时通知去开会，从人民大会堂的北大门进去的。进了之后被引导往西拐，而以往他们常往东拐在福建厅开会，我当时心里感到很奇怪。于桑在前，曾威跟着他。施义之跟着我，后面还有没有人我已经记不清了。走了没多远，大帷幕后走出两个身材高大的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一左一右把于桑架走了。于桑披了一件军大衣，回头看了我一眼，连军大衣都掉下来了。因为离得很近，我还没缓过神来，自己也被架走了。

我虽然没想到自己会被抓，但还是有一点精神准备的。对我宣布：“中央决定对你保护审查。”我说“好”。随后两个高大的军人架着我乘小电梯下楼，从西北门走了，到了交通干校。

关我的房子我推断关过王恩茂，因为墙上还写着“打倒王恩茂”。屋里被子上还插着一根长长的针。我的手表也还没有没收，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很仓促，房子没有清理好。当时的情况是林彪事件后，“解放”了大批老干部，很多老干部都放出来了，院子里基本都没人了。

第二天早晨也没有人做饭，我吃的是红薯，因为做饭的人也走了。我在那儿关了16个月。

我恢复工作后还念旧，又去关过的地方看了，第一次看还在，以后又去一次时，那地方已被拆掉了。

我出来后给周总理写了两封申诉信，施义之等人认为是刁难当时的公安部领导。我说，其实不是，我是按正常的渠道写的信。可是不久又赶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事情又搁置了。

10月27日公安部召开动员大会，施义之作了动员讲话，第一句话就是：“李部长被害了。”他传达了中央指示，关起门来整顿，停止对外工作联系，大家以党性原则揭发可疑点，追查到底。动员会后，公安部以自报公查的方式查了每个人21日晚的行动，牵扯了很多。两个多月的清查，使许多干部被牵连，受到了伤害。

1974年1月中旬，破案组确定李震是自杀以后，华国锋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到北京卫戍区开会。华国锋说：经调查，李震的死与于桑无关，解除对于桑的审查，刘复之不能放，继续审查。

到了1974年底，在一次破案组会上，吴忠提出应解除对刘复之的审查，隔离久了对他的身体不利。华国锋表示同意，并具体指示：解除刘复之保护审查后安排回家，不恢复工作。

后来，于桑对华国锋印象一直很好，他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华国锋这个人很厚道，坚持实事求是，说“一个副部长怎么会把一个部长给杀了呢？不太可能的事”，让我很快脱离了干系。

至此，这个案子破了，被牵连审查的人绝大部分也被放出来了。但因为种种原因，李震自杀的结论没有立即公开宣布，甚至有人说什么“即使不是他杀也是被逼死的”。

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3月，经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报告，中央批准了破案组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报告称：据调查，李震因追随谢富治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林彪问题败露后，畏罪自杀。

□ 《百年潮》2009年第7期

~~~~~  
【人物追踪】

鬼使神差的日子——顾准逝世三十五周年祭

• 朱学勤 •

十二月三日，顾准逝世三十五周年。鬼使神差，一个毕业多年的学生碰巧回校，邀同门同饮，我也忘记这一晚是顾准三十五周年忌日，却不由自主说起他在世往事，众生无语，停箸黯然。夜半回归，朋友转来柴静博客上一篇悼亡文字，长达八千五百言，情真意切，结语说：“我们都是顾准的后人”。我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经常在央视调查栏目上出现的女记者，写信问同在传媒工作的儿子，这是CCTV的“柴静”吗？那样一个地方能出这样一个人？儿子尚未回信，一个学生的短信到了，确证如此，而且约我写稿，纪念这个应该纪念的日子。

顾准的人间悲剧，这些年已经发掘得差不多了。那天我与学生说的是这一悲剧的反面，将近二十年前，我采访顾准家族时遭遇的另一人物——施义之先生。我想让学生明白的是，人间若有悲剧发生，总有其正、反、里、侧，只有把方方面面都看到，才能探及悲剧纵深。否则，只能落入新华体，再树一个好人好事，平面走形，那才是对悲剧的亵渎。

一九九一年我写“迟到的理解”，先在香港发表，后在大陆“文汇报”转载。一位顾准家族中的年青人——北京社科院研究生学报的高南先生，看到文中提及顾准临终，欲见老母而不得，母子相距不过数百米，却酿成生离死别悲剧这一段，担心我不了解内情，再写下去可能出错，自费坐火车来上海，告诉我这一家族的一些内情。闻之心惊，于是反过来坐火车去北京，请他陪同，去寻访那个“阻扰”顾准母子相见的“罪魁祸首”，前公安部主官，顾准妹夫——施义之先生。

初见施义之，七十开外，双鬓染霜，穿一身军装无帽徽无领章——我称“素服”，虽落魄，却留有军人威仪。此时已被开除军籍、党籍，门可罗雀，门厅亦浅陋。我因此前不久脱军装，见有同样“素服”之前辈，则感亲切。他听说我也是落难之人，遂有感慨：“怪不到你能来看我，你大概能理解。我们这一家为什么总是跷跷板，总要有头是反革命？顾准倒霉时，我是军政委，公安部军代表；现在顾准翻案，成了思想界先驱，我却成为反革命，双开除。”这就打开了话匣子，可惜当时经济窘迫，没有录音笔伴随，以下文字为记忆所及，文责在我，无关施老先生。

施为一九四九年前参加部队的老军人，大军南下，经无锡宜兴，娶顾准之妹，遂成顾准家

人。此后又北上，为陆军驻山西某部军政委。文革第二年，毛号召三支两军，施义之进入公安部任军代表，排名在谢富治、李震之后。谢无暇理部务，交李、施掌政。李震为一九三五年清华一二九运动参与者，是中共陆军将领中少有的知识分子。林彪事件后，李在公安部大楼的地下室暖气管道旁离奇身亡，为文革中军界高层两大死亡案之一，另一案为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夫妇在熟睡中被同一大院内军人枪杀。李案发生，周恩来震惊，亲自调人组建专案，倾向于认为李震是他杀，有政治阴谋，限期破案。施义之参与专案组，调查后排除他杀，以自杀结案。李震死后，依军代表主管一切，公安部实际当家人即为施义之，故而外界传言顾准妹夫为公安部部长，虽不确，也非讹言。当天施义之与我谈了一下午，有两件事让我意外，深感历史难写，尤其写人，言及深处，难处自现。

一是七〇年代初，宁夏西、海、固地区发生大规模回民暴动。部队武装平叛后，周恩来令施义之去当地视察。临现场，见民众赤贫如洗，眼含憎恨，施内心震撼，向周恩来驰报，称当地为“老、少、边、穷”，应开仓赈济，方能平息乱源。并有具体建议：海军被服仓库有军大衣闲置，应尽快发放，火车运送，让难民度过严寒。周允其请，遂有西、海、固当年到处是难民身披蓝色军大衣之奇观。今日大陆文件用语，“老、少、边、穷”已集为固定词组，即施义之首创。文坛作家张承志因采访西海固著“心灵史”而闻名，早于张十年，施已进入西海固。

二是一九七六年清明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民众籍悼周而抗议，公安部派出大批便衣侦探，一日三“参”，随时密报。施义之在密报照片中，赫然发现叶剑英座驾，牌照号码历历在目。惊魂之下，徘徊再三，施决定扣压这张照片，隐匿不报。此事天知地知，密报者不知，叶本人不知，毛泽东不知，仅施一人知。车内究竟是叶，抑或他人？施事前不敢与叶言，事后不久已经沦为阶下囚，更不能与叶言。唯一可测可度者，毛泽东病中闻天安门乱起，倘获悉叶帅座驾于广场出没，断不会仅以老病开缺之。“黑手”云云，有此证据，上挂下联，镇压之凶狠，株连之广大，将大出一圈。此事说小，不过是一军人对前辈动恻隐之心；说大，则大至血海般干系，有可能牵动下半年怀仁堂事变能否发生，如何发生。我为施义之当年敢有如此担待而感佩，也为他此后遭遇而唏嘘。如果说他“反革命”，真罪状是在这里，而不在被指控的其它方面。我今披露此事，一是为老人去世十几年，墓木已拱，史料虽为孤证，待考，却也不能随其埋葬；二是为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史学同行引戒，知史方治史，一九七六年两件大事，上半年广场沸腾，下半年宫苑突变，并不像当事者自言、官史者编撰那样简单。

第三件意外，施义之自己并未说及，我是为施言所动，回沪后征信于顾准家族另一知情人，偶然获悉。顾准晚年妻离子散，孩子们投靠谁，谁在庇护？我们当年或追述或纪念，却把这一背景忘记了，其实还是施义之。顾准遗孤数人，施义之亦有子女数人，皆为知青，上山下乡，年终返京探亲，就在施家打地铺，一地铺睡十人。节后离京，施义之让原部队警卫员去内蒙草原打黄羊，施操刀均分，一人一份，送他们上路。上峰提醒施义之，不该收容反革命子女，要注意影响。施回答：他们的父亲是反革命，我已经与他划清界限，他的孩子是“可教育好子女”，我不能把他们推出门外，总要有一点人道主义？顾准晚年欲见老母而不可见，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施当时已觉身处险境，尤其是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后。有一次借工作汇报，向江青请辞，脱离公安部，返回老部队。江青怒斥：这是革命需要，你不要不识抬举！从此不敢请辞，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下半年怀仁堂事件发生，天地翻转，施作为“三种人”或“谢富治代理人”，被隔离，被审查，终被双开除，沦为“牛鬼蛇神”。

我与施义之只有这一次“初见”，再无“复见”。当时交浅言深，感谢他信任，说好第二次带录音机去，记录他的“口述史”。不料刚回沪，十天后高南来电话，说施老先生突发脑溢血去世。发病原因很多，但那一天见面后，他一连几天难以平静，也是原因之一。此后是我难以平

静，老人遽然离世，岂非我之罪？

我今以施义之往事，纪念顾准逝世三十五周年，以赎前衍。是否亵渎顾准？起顾准于黄泉，他也会同声一叹：“我们这一家为什么总是跷跷板，总要有头是反革命？”顾准之悲剧，虽千万人吾往之，可谓“惊天地”；施义之用尽被弃，也是悲剧，可谓“泣鬼神”，这是悲剧之正反，却发生在同一个家族里，这就是一个家族的悲剧了，而是时代悲剧。所谓“惊天地而泣鬼神”，从此我另有所解。祭神，神如在，鬼也在，这就是我们的时代。生活比文学更文学，已不劳小说家言，面壁虚构。但在我们的文学中，是读不到神鬼天地，人间世界的。而我长远不读文学，尤其是现当代中国文学，文学回避了生活，也会跳大神，那是另一种神。说“当今中国文学处于最好的时代”（王蒙近语），唱“纵做鬼，也幸福”（王兆山近诗），既不“惊天地”，也不“泣鬼神”，只是讨活人欢喜。这两人是应该搭档，一起去法兰克福的。离开这些“二人转”，去读真实的日子，能纪念顾准，能纪念一个前任部长的悲剧，也能戳穿另一个前任部长的诳语。

~~~~~

【文革一页】

鲁瑛是怎样从上海到北京的

• 钱 江 •

◇ 悲剧人生一声长叹

鲁瑛（1927—2007），“文革”时期一位著名人物，原本是上海《解放日报》党委办公室主任，于“文革”爆发的1966年6月初被突然调到北京，作为“中央工作组”成员进驻刚刚被陈伯达夺权的《人民日报》，实际上进入了《人民日报》领导层。随着“文革”进程，他的地位逐渐升高，于1974年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在陈伯达、姚文元的指挥下，做错了许多事情。“文革”结束后，他被开除党籍，撤销领导职务，接受审查。因此，他的人生旅程充满悲剧色彩。而这场悲剧的开端，始于1966年6月初，当时在上海担任《解放日报》社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的鲁瑛接受谈话，被编入陈伯达率领的到《人民日报》“夺权”小分队。

在临近自己生命终点的时候，年届八旬的鲁瑛努力回忆自己的一生，他对笔者说：“当年要是不离开上海的话，我的后半生就不会是这个样子。”言罢一声长叹。

◇ 突如其来的谈话和使命

对他来说，一生中有许多事情压根儿就没想到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往事从头说起，那是在1966年6月初的一天，可能是6月2日，最晚是3日，时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的鲁瑛接到电话，说总编辑、党委书记马达找他谈话。

鲁瑛马上走进总编辑办公室，马达很郑重地对鲁瑛说，根据市委的决定，借调你和邵以华到北京《人民日报》去工作，因为那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搞“文化大革命”，但那里有很多干部跟不上形势，不能工作了。这样一来，《人民日报》很需要人，中央就要我们上海支持，调干部参加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市委决定调你和邵以华两人马上去。从目前来说还是借调，你们到北京去，家属不去，孩子也不去。至于以后怎么办，待以后再说。

这时，鲁瑛还主管着报社的华东新闻部，工作压力不轻，他回忆说：“我看马达对我说这番

话的语气是非常肯定的，表明这是上级的决定，丝毫没有征求我意见的意思。我就当场表示，接受组织安排。”

马达马上吩咐说，你们明天就走，只带组织关系。

马达找鲁瑛是单独谈话，随后还和邵以华谈话，估计是同样的内容。

◇ 手提一只小包到北京

当时，对北京发生了什么，鲁瑛并不知情，他当时比较关注的还是上海和华东地区的事态。不过，他已经认真阅读了《人民日报》6月1日的头版头条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感觉这篇社论“来头”很大（但不知道这是陈伯达改定的标题和文章）。从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此时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半年以来国内政治局势急剧动荡，他感觉这次运动的规模将是巨大的。

事后鲁瑛得知，就在大约3天前的5月31日晚上，陈伯达领带一个“中央工作组”来到人民日报社，夺了总编辑吴冷西的权。这个工作组由陈伯达挂帅，主要助手是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工作组成员还有钱抵千（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朱悦鹏（《解放军报》党委委员、记者处处长）、尚力科（《解放军报》党委委员、军事工作宣传处副处长）、杨丁（《红旗》杂志社）。另从上海抽调2人，名单尚未确定。

空缺的两人由上海《解放日报》抽调，此事由中宣部通知上海市委。根据鲁瑛的说法，他后来才知道，上海方面最初确定的人选正是马达。但这时上海的局势已经不太稳定，马达又是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特别倚重的“笔杆子”。陈丕显不同意放他走。马达也不想到北京去，因为那里已经风云变幻不可捉摸。于是就选上了鲁瑛和邵以华。

◇ 鲁瑛从此走上了一条悲剧道路

和马达分别谈话后，鲁瑛和邵以华马上到上海市委组织部转党组织关系。第二天两人就乘飞机来到北京，由人民日报社派人从机场将他们接到王府井大街上的人民日报社招待所。

跟随陈伯达于5月31日晚到《人民日报》“夺权”的，还有当时担任《解放军报》代总编辑唐平铸，他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后，很快成为陈伯达率领的“中央工作组”在《人民日报》的代表，主持日常工作，他单独找鲁瑛谈话，表示欢迎他来《人民日报》。

唐平铸对鲁瑛说，你写的东西不错，以前写的山东下丁家大队的典型报道我认真地读过。我们已经研究了你的工作，决定由你来担任《人民日报》党的临时工委秘书长。还根据你在《解放日报》的工作情况，安排你主管报社的记者工作。他顺便告诉鲁瑛，将安排邵以华负责行政工作。

当天，鲁瑛和邵以华在《人民日报》的招待所同住一屋。第二天，他们前往中组部转了组织关系，但是两人的工资关系还在上海《解放日报》。鲁瑛的妻子张文卿每月向北京汇出生活费。当时，鲁瑛的家庭经济情况相当紧张，因为建国后不久，他的大女儿在患病医治过程中花去了他们夫妇的全部积蓄，依然不治。以后他们又有了3个孩子。鲁瑛是行政15级的工资，每月120元，妻子工资不高，加上对老家还有一些负担，这家人的花销就相当紧了。所以鲁瑛前来北京，提着一个小包就上了飞机，没带什么衣服，以至于接待了几次外宾以后，外交部礼宾司的干部提出意见说，《人民日报》的鲁瑛穿得太差了。当时鲁瑛也确实没有什么好衣服。

◇ 再也没有回到上海

初到北京，从上到下，鲁瑛对什么都不熟悉。不久后就是“检阅红卫兵”的大潮，鲁瑛负责调配记者们采访，8月的一天，他也穿上绿军装上了天安门，就站在离开毛泽东不远的地方。

那天，有一阵子毛泽东和焦裕禄的女儿在一起，鲁瑛身穿军装走到了他身边很近的地方。毛泽东看到了鲁瑛，觉得不熟悉，就问道：“你是哪里的？”

鲁瑛回答说：“我是《人民日报》的。”

毛泽东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鲁瑛。”

毛泽东就说：“哦，我不认得。”

这就是鲁瑛和毛泽东的第一次直接接触。

陈伯达“夺权”后相当一段时间，唐平铸是报社日常事务的主管，他带来了《解放军报》的几个处长，其中的尚力科是鲁南人。

没有想到风云变化，唐平铸的地位很快不稳，又过了没多久被“揪”了出来，靠边站，接受审查。这使得鲁瑛在报社事务中逐渐更多地负责起来，职务越来越高，他和张春桥、姚文元的交道和接触也越来越多了。

来到北京以后，鲁瑛很想回上海工作，但是几次想提，都被当时突然发生的事务打消了念头，直到最后也没有回到上海，而且最后终老于北京。

在来到北京的日子里，特别是遭遇了“文革”带来的大起大落，他对家乡山东老家黄县（今为莱州）越来越怀念。所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对童年和青少年的记忆是最清晰的，回忆起来条理清晰而且生动。但是，对于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他记忆最清楚之处还是自己是怎么从上海来到北京的。“文革”在他的头脑里已经造成极大的错乱，各种事件的回忆前后缠绕矛盾，纷乱一团，怎么也谈不清楚。

不过，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结束了审查之后的生活在总体上还算平静。他来到人民日报出版社工作到离休，被授予高级职称。2007年12月25日，因心脏病突发，他于沉睡中在北京的家中病逝。

□ 《世纪》2010年第1期

~~~~~

【知情者言】

在钓鱼台的日子

• 阎长贵 • 向继东 •

—

向：江青不喜欢常住北京，喜欢到处走一走。

阎：是的，江青每年都要在外地住上半年，甚至七八个月。一般是每年国庆节后就到广州

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五六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反正，她像候鸟一样，几乎年年如此。但唯独1967年是例外，她一直待在北京，哪里也没去，住处就是钓鱼台十一楼和中南海丰泽园“两点一线”。

向：这是为什么？

阎：当然是忙嘛。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江青都参加了。12月份，江青不是接见这个造反派，就是接见那个造反派。1967年正是“文革”关键阶段，她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开会、接见、看文件，时间都扣得紧紧的。大概是1967年6月，江青身体不大好，我们工作人员都劝她注意休息。她跟我说：“主席也叫我到外地去休息一段时间，还说，不要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你看，这么多事，我怎么走啊！”我说：“事情多，但身体也要紧啊！”说实在话，当时我真希望她到外地去，我也好借光乘飞机、坐专列到外地去看看。

向：江青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阎：听说过去江青喜欢叫工作人员陪她打扑克。可她玩起来，只能赢，不能输。如果遇到强手，不让她一点，她就可能输；但让着她又不能露出破绽，否则她就会发脾气。由汪东兴、张玉凤等任顾问的一本书中说：“江青打扑克的兴趣甚浓，但缺乏应有的牌场风度，动不动就摔扑克，发脾气，弄得与她打牌的人很不愉快。毛泽东就此规劝过江青，无奈收效不大。”这应该是事实。

向：你陪她打过扑克吗？

阎：没有。她1967年整整一年都没打过扑克。

向：她还有别的兴趣吗？

阎：听说江青爱养猴子、养狗。她说猴子“最富有人情味”，狗“很忠实于主人”。她往往在广东买来，带到北京玩，玩腻了就送给动物园。但这些事我没见过。在1967年，江青除工作和开会外，就喜欢看戏、看电影。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有时也在天桥工人俱乐部）不断地演出“样板戏”，江青经常去看，也可能是她叫演的，或为她演的。不论在钓鱼台住，还是在中南海丰泽园住，晚上只要不开会，她都要看电影，据说这是她的“工作需要”。所以，警卫员和护士有个任务，就是挑电影。每天午饭时，要写几个电影片名送给江青，由她选定一部，再告诉有关部门调片子 and 放映。在钓鱼台是在十七楼放映厅看，在中南海是在春藕斋看。

向：她是否要人陪看？

阎：要。有时请陈伯达来，有时请康生来，有时请戚本禹来，有时把他们或更多的人一起请来。如果这些人都没来，就要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她看。

林青山在《江青沉浮录》书中说我（书中称“小阎”）初看黄色电影时，“脸红心跳”，后来变成“黄色电影迷”，这纯属造谣污蔑。江青1967年看的片子主要是国产片，其次是香港片子，看外国片子倒不是很多。

向：江青和毛泽东一起活动多不多？

阎：很少。“文革”开始后，从底层到高层，各单位的周末舞会都被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取消了，唯独在中南海举行的舞会照常进行。这里的舞会，有时还是化装舞会（化装者多为军队文工团的女青年），还有著名京剧演员如谭元寿、马长礼等人的清唱，其名义是让毛泽东休息休息。这些活动，江青常参加，总理有时也参加。

## 二

向：说江青是“旗手”，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你能谈谈江青“旗手”称号的由来吗？

阎：江青搞了八个“样板戏”，于是有人称她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这称号当时主要出现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小报上，在中央党刊和《人民日报》上，我没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上的人说过这样的话。穆欣说，陈伯达、戚本禹把江青抬上“文艺旗手”的宝座，但他并没举出依据来。我认真反复地翻检《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想查一查到底是谁最早把“旗手”的桂冠戴到江青头上，可一直没有结果。到现在，这件事究竟谁是始作俑者，还是

一个谜。

大概是1967年4月，江青交给我一篇文章，作者是当时就可称为京剧表演艺术家的杜近芳。她在约6000字的文章中，热情赞扬江青，一共用了20多个“敬爱的江青同志”，即凡出现江青名字时，都在前面加上“敬爱的”，并称江青是“文艺战线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最坚强、最英勇的旗手”。

向：你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吗？

阎：就我当时的认识，我是完全赞成的，只是觉得有的地方应当稍作修改。于是我向江青提了两点建议：第一，是不是不称你为“旗手”好些？“旗手”应该说是毛主席。江青说：“对！对！”接着吩咐我：“你去告诉关锋同志，叫他给我把这个关。”第二，这篇文章用了20多个“敬爱的江青同志”，“敬爱的”是不是太多了？在关键地方用一两次就可以了，这样文章还朴实些。江青说：“这个意见也好，你一并告诉关锋同志。”当时我还为江青接受了我的建议而高兴。我这样做完全是从维护江青出发的，觉得这样对她有好处。

向：关锋当时还兼《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吗？

阎：是常务副总编辑，且分管中央宣传工作。我离开江青那里，立刻到钓鱼台十五楼关锋处，转达江青的意见，文章也交给了他。关锋说：“你回去报告江青同志，我给她把关，请她放心好了。”后来文章在1967年第9期《红旗》杂志发表时，把“敬爱的”三字只保留了两处，同时把“……最坚强、最英勇的旗手”改成了“……最坚强、最英勇的战士”。

向：文章这样一改，就低调些了。

阎：可文章发表后，杜近芳看到“旗手”改成“战士”了，很不满意，怒气冲冲地拿着《红旗》，找到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作家金敬迈、李英儒（当时该文艺组办公室和《红旗》杂志在一栋办公楼内）等询问：“《红旗》杂志是不是有反对江青同志的反革命？为什么把我写的‘旗手’砍掉了？”文艺组接待她的人说，这事与他们没关系，告诉她可以直接到《红旗》杂志去问。接着，杜近芳到红旗杂志社责问。有关人员心平气和地给她做了解释，她还是不满意。据说，这件事还反映到戚本禹那里，戚说：“为什么不能称旗手？”，戚本禹不知道前因后果，就去问关锋，关锋有点生气了，跟戚说：“不要问我，你直接去问江青同志吧！”

这场风波，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关锋、戚本禹也没有跟我说过，直到1990年代才听关锋说起这件事。你整理这篇稿子时，最好不要点出杜近芳的名字。

向：其实，这里说出杜近芳的名字并不是对她的伤害，而是对历史的尊重。

阎：那需要说明一句：决不是杜近芳第一个称江青为“旗手”，她不过袭用了当时流行的话语而已。

### 三

向：“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有过这句话吗？

阎：这话我是听毛的服务员赵鸿安说的。他是管理毛泽东衣物的，也是山东人，我们是老乡，年龄也差不多。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聊天，他告诉我，毛泽东曾跟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说：“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我听了这话，心里热乎乎的，心想：在几亿人中，能有几人直接为毛服务？而自己就是一个，很自豪的。

向：这话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说的？

阎：当时赵鸿安没说，我也没问。后来经过询问，是毛在1960年代向江青的服务员张素兰致歉时说的。有一次江青去杭州，毛也在那里。江青为一件小事严厉责骂服务员张素兰：“组织派你来给我服务，你惹我生气，你给我滚！”张素兰很委屈，气得跑到西湖边哭。大家怕她有个三长两短，便把她找回来，劝她、安慰她。李敏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把这事报告了毛。毛知道后，带着警卫员来到值班室，很亲切、很和蔼地对张素兰说：“小张啊，江青有病，脾气不好，看在我的面上，不要跟她计较，我给你道歉。服务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你们给她服务，就是为我服务啊。”

向：你对江青总体印象怎样？

阎：大家说江青难侍候，态度喜怒无常，对工作人员严厉，但她并不是整天板着脸。她很注意礼貌，逢年过节，见了你总要问好，当然你也要注意问她好。她有时也跟工作人员聊聊天，谈谈家常，开开玩笑。她跟我不只一次谈过她在1930年代做地下工作的情况，还谈过毛主席在转战陕北时，指挥战争多么“神”：不仅指挥自己的军队，还能指挥敌人的军队，等等。陪她看电影时，她有时也比较随便地谈她的看法，比如看《英雄儿女》，老工人的儿子王成牺牲了，志愿军某师长的女儿也叫老工人养大了。江青说，“师长到这时候，就不一定要再认女儿了”。看一个关于空军题材的电影，她说我们的电影有个问题，太注意技术细节，不注意提炼一般的问题，业内人士不爱看，业外人士看不懂。

向：对于电影，江青是内行。

阎：江青有一次跟我开玩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那天，我们和她一起乘车从钓鱼台去中南海（她的护士和服务员是两个没结婚的女孩子），她一点也不避讳地对我说：“长贵同志，听说你都有两个孩子啦，生这么多干什么？尝尝那个滋味就行呗！我这辈子就只生一个。”我本来比较腼腆，被她这一说，弄得我脸热热的，不知回答什么好。当然，她不高兴的时候，对工作人员特别严厉，稍不如意就骂人，张口就是“你给我滚！”江青还怕声音，怕光，怕风，怕见生人，和林彪差不多，只是没有林彪那么怕得厉害。夏天她怕冷气，别人再热，也得把空调关掉……

向：江青的厨师一直是程汝明吧？

阎：1961年起，程汝明一直是江青的专职厨师，直到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抓。程师傅做的饭，很合江青口味。江青爱吃鸡，但吃法和别人不同：一斤左右的雏鸡肉她很爱吃，而老母鸡肉她不吃，只喝老母鸡炖的汤。每到这时，程师傅就把鸡肉放点盐和佐料，让工作人员吃，我就多次吃到这种鸡肉。在生活水平不高的1960年代，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错的享受。

向：江青吃什么还是蛮刁的？

阎：她在一次散步时就跟我说：“现在孩子都大了，都工作了，我和主席的工资，除了吃饭、穿衣，没有别的用场。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吃山珍海味。你把这个意思可告诉东兴同志。”说实话，就吃来讲，江青说不上多么奢华，但在如何吃上，也有点难侍候。她住在钓鱼台，不论到中南海开会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都经常带着她的厨师程师傅；如果程师傅没去的话，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的师傅们就江青的口味总要打电话问程师傅。

#### 四

向：请你说说江青和陈伯达的关系。

阎：那时，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央政治局，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副组长，但实权在江青手里。当年红卫兵就说“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这是很到位的说法。陈伯达和其他一些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作为当事人，都曾这样或那样回忆过。陈伯达就说“江青是中央文革第一首长”。王力回忆也说：在中央文革小组中陈伯达“不过是个傀儡”。穆欣在《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版）中说：陈伯达“凡事都得看江青的眼色”。每逢开小组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只要江青还没到会，陈伯达这个组长和其他小组成员都得耐着性子等。开会时，经常是江青包场，说个没完，从不顾及别人的想法。一旦她与陈伯达发生分歧，江青就叫休会，把陈伯达拉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等，直到陈伯达被“打通”回来继续开会。

向：就你所看到的，感到这些说法站得住吗？

阎：在中央文革小组里，确实是江青说了算。我们工作人员也感觉得到，小组成员对组长陈伯达的话似可听可不听，而对江青的话，一点折扣都不能打。一句话，小组成员对江青都是毕恭毕敬的。

向：“文革”初期，好像陈伯达因身体不适而一度住院，工作由江青代替。

阎：1966年8月底，由于陈伯达生病住院，中共中央于8月30日发出通知：“陈伯达

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这个通知一发，使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言论和行动，更有法理依据、更名正言顺了。

向：王力回忆录还讲到江青骂陈伯达要自杀的事。这是怎么回事？

阎：1967年1月4日，江青和陈伯达公开宣布打倒陶铸。毛泽东1月8日予以肯定，到2月10日又批评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并说：这件事就是你和江青二人搞的，毛要文革小组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其实那是江青硬拉着陈伯达一起搞的，吓得陈伯达都要自杀了。康生也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评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后来江青知道陈伯达要自杀的事，指着他的鼻子骂：“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

向：你亲眼看到什么吗？

阎：我亲耳听到江青数落陈伯达自称“小小老百姓”的事。一次，在十一楼会议室里，不知江青和陈伯达商量和争论什么问题，忽然听到江青数落陈伯达：“你张口‘小小老百姓’，闭口‘小小老百姓’，你是什么‘小小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你自称‘小小老百姓’，不是谦虚，是推脱责任！”没听到陈伯达说什么，只听到他一声长叹。“小小老百姓”确实是陈伯达的口头禅，不论见了谁——包括普通工作人员，他都双手一抱拳，“我是小小老百姓！我是小小老百姓！”不过，我倒觉得，江青确实抓住了陈伯达爱推脱责任这个弱点。

向：还碰到些什么事情？

阎：1967年1月的一天，我在十六楼值班室里，曾看到江青和陈伯达并排坐在沙发上，陈伯达哭丧着脸，低头不语。江青对着陈伯达说：“看你那熊样，这么怕，这有什么了不起……”听到江青这样说，我赶忙退了出来。后来才知道是这么回事：1967年1月19日，陈伯达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上批评肖华，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陈伯达的话马上传到北京军区，北京军区的造反派立即行动抄肖华的家，抓肖华，肖华从后门越墙逃走。毛泽东说肖华还是要保，陈伯达吓坏了。江青这次教训他，也是给他打气。

向：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有没有威信？

阎：江青对陈伯达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我所看到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对陈伯达也不怎么尊重。在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后，一次在十六楼会议室里，王力、关锋、戚本禹公然奚落陈伯达；陈伯达也不说什么，最后竟冒出这样一句：“请本禹同志替我在主席、江青同志面前多美言几句。”听到这样求情的话，我感到很惊讶。

向：陈伯达也确实有点窝囊。

阎：这“求情”的话，我觉得有两层含义：一是他知道戚本禹和毛泽东、江青关系好；二是希望也是告诫戚本禹不要在毛泽东、江青面前说他的坏话，打他的小报告。

向：陈伯达儿子陈晓农近年在香港出版《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有人读了批评说：“陈晓农是个真正的孝子，他在书中为父亲做了全面的辩护……”依我看，陈伯达也有无奈和值得同情的一面。

阎：说到江青对陈伯达，还想顺便说说江青对陈伯达妻子刘叔晏的态度。1967年11月中旬我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刘叔晏看到后给我打电话，先是夸了一番，然后说：“我想请您跟江青同志说一下，麻烦江青同志给我安排一个工作。我原来是搞《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范若愚专案的。我想进一步研究一下知识分子演变的规律。江青同志有什么指示，您写个条子转给我就行。”我说：“好吧，我帮您问问江青同志。”陈伯达的夫人交给我这么一个任务，我怎么办呢？我当然要告诉江青。有一天晚上，从十七楼看完电影回十一楼是走回来的，同平常散步时一样，江青走一段要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在她休息时，我向她报告了刘叔晏请她给安排工作的事情。江青说：“陈伯达的老婆怎么叫我给她安排工作？她的工作应由汪东兴安排。”接着没好声气地说：“这个地主婆不好好干事，还叫我给她安排工作，别理她！”江青叫我“别理她”，我当然不能给她传递什么信息，可我感到她毕竟是陈伯达的夫人啊……说实话，在那段时间里我很怕碰到刘叔晏。

向：中央文革小组的事你了解得真多。

阎：中央文革小组还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开会不做记录。

向：为什么？

阎：江青不让记。为什么开会不让做记录呢？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按照常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应作记录，可是却从来不准。她以‘机密性’为托词，行逃避责任之实。”这样，她就可以信口开河。后来，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要求每次开会要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他的办公室派人做记录。头一次由矫玉山、周家鼎来做记录，江青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当第二次王广宇做记录时，江青立刻神经过敏了，责问说：“我们开会还要做记录么？是谁叫你来的？”周恩来回答说：“是我叫来的。”又转身对王广宇说：“今天不用记了。”总理也拿她没办法。

向：再问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央文革是多大的机构？

阎：总起来说这个机构有近200人，其成员都是按照那个年代的德才标准，从一些中央单位、特别是军队选拔来的，可现在一谈到中央文革小组，好像就是那几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倒台后，就只剩下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5个大人物了，其实不算四大行政区派来参加的成员，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包括陶铸，共有14人。

应该说，谈中央文革小组光看到他们是不全面的，应该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机构也算进来。这个办事机构的前两任负责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一任是穆欣，副的有戚本禹、曹轶欧（康生夫人）。江青不满意曹轶欧，就以照顾她年纪大为由拿掉了。第二任是王力。第三任是宋琼，他原是《解放军报》记者部的主任，李讷1967年1月在《解放军报》造反，把宋琼揪回去了。第四任是王广宇，他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干部。随着王力、关锋的倒台，王广宇被退回马列研究院，次年3月又以“莫须有”罪名投进监狱。第五任是我，副的是矫玉山。我的任职时间很短，1967年12月上任，一个月不到，1968年1月9日就被隔离审查，后来又被投进秦城监狱。差不多与我同时被诬陷入狱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党总支书记王道明，工作人员张根成、周占凯，他们都是军队的基层干部。接替我的就是李讷，她是第六任，也是最后一任，她倒是善始善终的。

向：李讷当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这个机构江青控制就更方便了。

阎：叫自己的女儿接我这个位置，当然是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个办事机构嘛。

## 五

向：谈谈1967年林彪、叶群和江青的关系吧。

阎：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成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上任不久，就以他的名义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套军装。1966年8月18日，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前一天深夜，毛泽东突然要穿军装……由于建国后毛泽东没有穿过军装，一时还找不到合体的制服，只好将8341部队一个身高体胖的警卫干部制服拿来凑合了。

向：这一穿，就穿成了“文革”中的军服时尚。林彪和叶群到钓鱼台十一楼看江青的次数多吗？

阎：我在那段时间只见过一次。大概是1967年春天，林彪来到十一号楼会议室。工作人员都知道，林彪来了不用上水，因为他不喝水。毛泽东用大大小小的宣纸给江青写过好多幅字，江青拿着毛泽东写的几幅字下楼来，转送林彪。江青说：“这几幅赠林副主席，还有几幅送给老夫子（指陈伯达）。”林彪话很少，脸上没什么表情，也看不出他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叶群说：“我们是一介武夫……”表示很感谢江青。至于这次他们还谈了些什么，我就知道了。

向：据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叶群曾说：“反正我认准了一条：首长要紧跟主席，我要紧跟江青。今后她走到哪我就跟到哪，她不去的地方我也不去。”

阎：我觉得，张云生的回忆是可信的。叶群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确实处处学江青、跟江青，对这一点我有多次经历可以证明。江青在大会上讲话，或接见红卫兵以及其他群众时，几乎没有一次不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或者说：“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

叶群在接见红卫兵和群众时也说：“我代表林副主席……”在许多群众场合，叶群经常带头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那时接见红卫兵的会议多，还不断有“样板戏”演出。叶群经常给我打电话，问：“今天的会议（或演出）江青同志去不去？”我就问她：“您去不去？”叶群说：“江青同志去我就去！”类似的电话很多，我都如实回答。如果事先我不知道，我会在问过江青后，再打电话告诉她。

向：事实证明，那时江青和叶群的关系确实密切。

阎：1967年国庆节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去首都机场迎接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叶群早早去了，后见江青没来又要离开，周总理不让她走，她还是悄悄离开了。叶群回到毛家湾跟工作人员说：“总理说我走不得，他考虑的是外交，但我考虑的是政治。总理对江青不出场并不在意，但我抛开江青而独自在那里，对江青不是一种不尊重吗？我对总理说，江青来，我们两个都是妇女，我才不感到孤单；她不来，就我一个女性，多孤单呀！总理板了板面孔，不高兴地说：‘这成什么理由？你既然来了，就不能走！’我见和总理正式请假是脱不开身了，就趁后来总理没注意，偷偷溜了！”（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从这件事，也可清楚地看出叶群对江青的态度和心理。叶群还经常送给江青一些东西。当时毛泽东像章种类繁多，花样翻新，叶群搞到新品种，就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送来。1967年初夏，在北京还不到吃西瓜的季节，叶群让林立果给江青送来几个南方的西瓜。

向：据说叶群对江青生活很关心？

阎：是啊，叶群经常给我打电话问：“江青同志想吃点什么？你们那里搞不到的话，我们这里有办法。”我对这样的电话很反感，心想，江青想吃什么东西还搞不到？她有专门的生活管理员。所以这种电话我都“贪污”了，没向江青报告。

向：江青和叶群比较而言，你对谁印象好些？

阎：当时江青在我脑海里是一尊“偶像”，拿叶群和她比较，总觉得叶群不修边幅，有些猥琐，和江青不是一个档次。后来从张云生、吴法宪等人写的回忆录中看到叶群工于心计，能控制林彪，能当林彪的家，但我当时对此一点也不知道。我对江青和叶群合伙干的一些坏事，如抄上海赵丹、郑君里等文艺工作者的家，迫害孙维世致死等，毫不知情。应该说，1967年的江青和林彪、叶群的关系是蜜月期，虽有些分歧和矛盾，但还是过得去的。在我给江青当秘书的1967年里，我就没听到江青说过林彪、叶群的什么坏话，她也没告诉我和叶群（以及林彪）的接触，包括打电话，要注意什么。我进秦城监狱后，接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说，江青曾对他做过这样的布置：“叶群这个人很有心计，她打来电话，和给她打电话，都要做记录，以留作证明。”这就是说，江青和林彪、叶群的关系，到1969年已过了蜜月期。

## 六

向：你谈谈江青和子女及亲属关系吧。

阎：我只当过她一年秘书，知道的不多。有一次，坐江青的车从钓鱼台去中南海，在车上江青跟我们说：“主席说了，我们家三个孩子（指李敏、李讷和毛远新，毛远新亦叫‘李实’），他们怎么样，是左派、中派，还是右派，也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考验和表现。”她接着说：“李讷、远新还可以，李敏就比较糊涂，她同意‘炮轰’的观点——即主席也可以‘轰’。”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的女儿，江青是她的继母。我当秘书那一年里，李敏要我给江青转过信（一般是放在中南海丰泽园我办公室里，有时也叫人转给我），但我没见过她，直到现在我也不认识她。关于李敏的情况，我只是听别人说。据江青的护士许春华等人说，逢年过节，江青和李敏从来不去看毛泽东，都是单独去。李讷、毛远新和李敏的关系还好，记得有一次，李敏带着儿子从上海回来，李讷、远新还到车站去接。

向：还知道其他情况吗？

阎：毛泽东对子女要求很严的。毛家有个规矩，其子女对毛和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称叔叔、阿姨。许春华就告诉我，她给江青当护士后，李讷叫她“阿姨”，她就跟李讷说：“你比

我还大，怎么能叫我阿姨呢？”李讷说：“这是我家的规矩。你们工作人员都是和我父母同辈的。”许春华说：“那不行！”此后，她才不叫许春华“阿姨”而直称“小许”了。不过我没享受过“叔叔”的待遇，因为我们曾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一起工作，共过事，很熟了。

向：谈谈毛远新吧。

阎：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又是另一种情形。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儿子，1941年生，解放后，他妈妈朱丹华（已改嫁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把他送到毛泽东身边，成为毛泽东家庭的一员。毛远新在北京读的小学、中学，高中毕业后去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某炮兵营。

向：江青是否接受毛远新这个家庭成员？

阎：“文革”前，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我不知道，也没打听过；我看到的，只是“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文革”开始三四个月后，毛远新从云南回到北京，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母校“哈军工”参加造反队伍。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为有名气的造反派头头。他还到延边造反，参加过那里的武斗。他从东北回到北京，也是住在钓鱼台江青所住的楼。他和我们工作人员相处很好，我们都很喜欢他。有一次，江青从外边回来，问扶着她进楼的警卫员孙占龙：“李讷住这里吗？”孙占龙说：“李讷这两天没来，远新在这里住呢。”江青不高兴地说：“他在我这里住干什么？”孙占龙没说什么。当孙占龙告诉我们时，我们不理解江青为什么这样说，只是觉得她并不怎么喜欢毛远新。

向：毛远新和你说起过江青吗？

阎：“文革”中没说起过。大概是1967年的五六月份，毛泽东叫毛远新不要回东北了，留下来做联络员，帮助处理东北两派，即拥宋任穷派和拥陈锡联派的联合问题。毛远新和宋任穷、陈锡联都很熟。有一天，毛远新在我办公室正谈这个问题时，江青从外边回来，也到我办公室里，见到毛远新，高兴地说：“你是好孩子，这个联络员一定要当好……”江青也许是刚从毛泽东那里来，听到了叫毛远新当联络员的消息。这也说明，江青对毛远新的态度，也是以毛泽东的态度为转移的。“文革”后，毛远新退休后曾到我这里来过一次。在这次谈话时谈到了江青。1975年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时，江青叫他把保险柜里的文件整理一下，列个目录出来。毛远新列了个目录给江青，江青看了后说：“你只列了文件的名称，其内容是什么我还是不知道啊！”毛远新说：“江青显然是叫我把每份文件都搞个内容提要或摘要。这件事很费时间和功夫，我没答应。江青就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谈这个事，希望我给她做。主席在江青这封信上画了一个圈，没批什么话。我就去问主席，并说明我不愿做的理由。主席沉重而又缓慢地说：‘你帮帮她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向：江青是1991年5月自杀的。你对她的自杀有何感想？

阎：“多行不义必自毙”。希望绝灭了，用自杀来解脱。

向：据说江青自杀前就检查出咽喉癌了？

阎：我也看到过一份资料，说1989年3月30日，江青回到秦城监狱，被检查出咽喉癌。江青有过癌症经验，建国初她曾因癌症到苏联做过子宫切除。这回医院建议手术，江青坚决不同意——她不想成为哑巴。同年11月，江青再次保外就医。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在北京酒仙桥附近为她选了一幢二层小楼，并且安排了护士，为江青治疗。1991年2月15日，江青高烧不退，化名李润青住进医院。等她退烧后医生再次建议咽喉手术，江青还是拒绝。

1991年5月14日凌晨3时30分，值班护士发现江青用几块手帕连结成绳，系在浴盆上方的铁架子上，自杀身亡。

向：新华社1991年6月4日发出电讯稿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这个消息刊登在《人民日报》第四版的角落上。记得我当时正出差北京，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先是猛地一怔。

阎：到了那个时候，死是最好的解脱。江青曾对她的护士马晓先不止一次说过：“将来我是准备杀头的、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地养着，这个难些。”最后应验了她自己的话。



~~~~~  
【读史札记】

读《丁盛将军回忆录》有感：丁盛到底冤不冤？

• 倪庆峰 •

每次去香港我都喜欢去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书店买书。上周去香港公干，闲暇时我照例去铜锣湾书店买书，我一共买了三本书《胡温难关》、《双规之后》、《丁盛将军回忆录》。我这里主要要说的，就是开国少将丁盛，因为我一直对所谓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黄永胜有所研究，因此对开国少将丁盛也不陌生。

丁盛是四野的，又是林彪事件中所谓的重灾区广州军区司令，和黄永胜的关系又很好，可是却丝毫没有受到牵连，后来又调任南京军区司令。据说在那里和廖中将（指廖汉生——编者）配合不太好（江青说廖中将欺负丁少将）。解放后，丁盛参加了朝鲜金城战役。中印战争期间，丁盛是一员战功赫赫的少将，文革期间很得重用，算是开国少将中的佼佼者。可是令人不解的是最后没有因林彪事件牵连，却因四人帮而落难。

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几员大将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还有什么江腾蛟等，可是丁盛并没有打入林彪“反革命集团”，本身就是一件令人诧异的事。1964年7月，丁盛离开五十四军，奉调新疆，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这肯定是当初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意思，用意不详。丁盛不适合新疆建设兵团的工作，萌生去意。向上面反应过多次，请求调动，都渺无音讯。

1967年初在京汇报期间，丁住京西宾馆，隔壁是邱国光。邱是黄永胜小圈子里的人，当时虽仅为广州军区后勤部部长，却是军区党委常委。一天，黄永胜妻子项辉芳来探望邱，恰好丁也在场，项提及黄永胜等几位在京的军区领导欲在春节期间到林彪处拜年事，丁盛一听便要求同去，得同意。拜年时，丁没有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当面向林彪汇报了自己在新疆的困境，并同时提出了调离的请求，黄永胜在旁边也为之说项，林当场未置可否。

这次晋见，毕竟还是起了作用。丁后来在1967年中便接到调令，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惟据笔者查阅到的官方的组织史资料，丁调广州军区的军委命令，应是1968年2月15日才下达。这件事在《丁盛将军回忆录》里有详细的记载。如果丁盛这一次没有跟随黄永胜拜会林彪，不可能调往广州军区任副司令员。

可是，丁盛在他的回忆录里一再说，林彪可能不认识他。如果林彪不认识他，会让他担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我觉得丁盛这一点，有点不厚道，含有撇清的意思。俗话说：“大丈夫不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毕竟林彪或黄永胜对他有提携之恩，虽然林彪或黄永胜被打成了反革命，可也是对共和国有功之臣啊。

反正都这样了，何不索性冤到底，就追随林彪和黄永胜，一辈子追到底，又有何不可呢？1971年8月在长沙，毛泽东对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丁盛和刘兴元（黄永胜的亲家公）说，“丁盛、刘兴元，你俩和黄永胜的关系这么好，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我认为毛泽东这时在吓唬丁盛和刘兴元。《丁盛将军回忆录》里记载：“毛泽东说这话不对，我们又不是为黄永胜革命。我们干工作又不是靠黄永胜起家的。他倒了就倒了，他死了就死了，我们怎么啦？我们不是照样活着吗？照样干革命工作吗？怎么能这样说话。”然后，就撇清他和黄

永胜仅仅是工作关系，林彪似乎认都不认识他。至于林彪难逃广州另立中央一事，他说毫不知情，广州军区领导班子所有成员都不知情。固然丁盛这样说有他的道理，但为人要懂得感恩。俗话说：“知恩不报非君子，万古千秋做骂名”。

丁盛落难还真的与林彪集团无关，而与八竿子扯不上关系的“四人帮”有关。1977年3月24日，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座谈会全体会议上突然宣布：“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硬往‘四人帮’那里钻，他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叶帅再三告诫他，初犯从宽，再犯从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把他当成自己人，他到上海很隆重地接待他，他参与‘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密谋搞叛乱。他的谈话有记录可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听了丁的谈话以后加紧发武器，发了7万多件，并急忙派人到北京来向‘四人帮’密报。一个大军区司令参与‘四人帮’搞阴谋，搞夺权，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被华国锋点名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撤职，抄家，无尽无休的拉往各处批斗，两次长达两年多的不说任何理由、没有任何手续的关押，妻子儿女被赶出军区大院……

1982年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对丁盛下达了一个《免于起诉决定书》。决定书完全肯定了1980年起诉书中所列的丁盛罪状，“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而且“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只因为丁盛是“从犯”，于是“决定免于起诉”。

《免于起诉决定书》对丁盛“罪状”的表述与《起诉书》略有出入，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两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丁盛）他们谈了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这两句话分量很重，对丁盛投靠“四人帮”的决心表述得淋漓尽致，

“免于起诉”自然是宽大处理，但就性质来讲，仍属刑事犯罪，行政和党纪处分那是免不了的。职务早在1977年就没有了，决定书下达之后，接着是命令“退出现役”，交地方安置，开除党籍。原有的物质待遇自然都没有了，每月只发生活费150元。

把丁盛交地方安置，也是有条件的：沪宁线不行，回广州不行，北京更不能去。争来吵去，直至1984年7月才把他交给了南昌市老干局的一个干休所，而且不得随带子女。直到1999年9月去世，丁盛都没有获得平反。

我认为，有些地方丁盛的确很冤，没有做的事硬派在他头上。其实现实生活中，被人误会是司空见惯的了。丁盛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结局，很多程度上是由于他的性格。丁盛之所以觉得自己冤，主要是因为自己是共和国的功臣，怎么着也不能落这样的下场吧？其实，政治就是这样，相对于后来的林彪集团黄永胜、吴法宪等将军来说，同样地为革命出生入死，落了个“反革命”的罪名，这样看来，丁盛的结局又应该是很轻很轻的了。

（编者按：此文编者略作删节，文中涉及丁盛在战争年代的事迹等与文革无关之内容略去。）

~~~~~

## 【史林一页】

### 百问九一三（七）

• 舒 云 •

37、空勤机械师李平的腰带上是否有枪眼？

李平，34岁，天津人，1957年兵，1963年12月入党。时任空军34师100团三大队机务中队副中队长，256三叉戟主管机械师。1971年9月13日随机牺牲。李平的家在天津，三个小孩，老大是女儿，1963年4月出生；老二是儿子，1965年9月出生；老三也是儿子，1970年12月出生。李平牺牲时，女儿8岁，大儿子6岁，小儿子还不到1岁。李平爱人王淑珍是天津标准件厂工人，她生前每年清明，都要给李平烧一些纸，她惟一的愿望就是把爱人李平的遗骨接回来。

有人说李平的皮带上有一枪眼。据说李平的皮带曾拿到西郊机场辨认，因为李平的腰不好，皮带是特制的宽皮带。但到过坠机现场的孙一先说，现场没有拿回一件东西。1972年，上边也怀疑256三叉戟上是否有搏斗，让从现场照片中寻找尸体上的弹洞。空军专家组成员金华被“隔离”在地下办公室里，三天三夜，他仔细看了所有现场的照片。金华说：照片上洞多了，但没有发现尸体身上有任何弹孔，5号尸体（林彪）没有外电所传的蜂窝状窟窿，李平身上也没有弹洞。

李平的技术非常好，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机务干部。参军前他已经有工作，会修手表，会做像章。李平母亲是家庭妇女，李平父亲是蹬三轮的工人，李平报名参军连父母也没有告诉。他个子不高，体检时要不是悄悄踮了一下脚，就被刷下去了。在34师战友的记忆中，李平心灵手巧，能说会道，也很会唱歌，是个活跃分子。李平爱好摄影，那时很少有人照相，而他拥有两台照相机，孩子们经常看爸爸洗照片。所以，李平留有几张他自己的照相机拍摄的照片。

九一三事件前，李平回过一次家，走时什么也没有说。李平爱人王淑珍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一直联系不上李平，1972年，她去34师询问，部队也没有明确说，只说李平执行任务。1978年给了病故通知书，答应三个孩子养到16岁，每月每个孩子给15元。1993年底，李平爱人王淑珍又找部队，那时部队也穷，1994年6、7月，部队来人送了一点钱，两三千元，说是补助，并答应孩子养到18岁。再后来，工厂不景气，王淑珍1986年办了退休。又赶上房子拆迁，要交赞助费，王淑珍又去找部队，部队给天津民政部门出了个介绍信，减免了前期赞助费近一万元。

李平爱人王淑珍每月工资40多元，要养三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还要养几个老人，连吃饭都不够。孩子们上学连两元钱的学杂费也交不起，大儿子初中二年级就工作了。而那时，政治压力更大，虽然空军34师没有明确结论，但林彪飞机摔在蒙古家喻户晓，老百姓搞不清怎么回事，传言很多。李平的几个孩子在学校成绩优秀，但却迟迟戴不上红领巾。终于三个孩子长大了，建立了家庭，其中两个孩子有了稳定的工作，而王淑珍却积劳成疾。1997年她因脑梗塞住院，以后每年都要住一次院，2005年11月逝世，享年69岁。

### 38、为什么蒙古对中国人去坠机现场一拖再拖？

1971年9月14日11时50分，蒙古外交部来电话，同意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三个人去现场。并说专机已经准备好，下午即可动身。可是这时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还没有给国内打通电话，到失事现场事关重大，没得到国内指示前，不能冒昧行动。于是大使馆借口尚未准备好，请求推迟起飞时间。午饭后不久，蒙古外交部又来电话催，说专机已经准备好，13时左右出发。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还是请求推迟。

一直到18时，终于盼来国内指示，要许文益大使亲赴现场，详细观察飞机失事的原因，飞机残骸可以拍照取证。如有尸骨应要求带回，没烧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转交我们，写明清单和

收条，并注明如有蒙方取走的物品和文件，也希望查出交还我们。

这封电报有意回避了飞机的性质和死亡者的身份，但许文益已经感到“事情”比预想的还要严重。如果是一般的失事飞机，使馆工作人员去看一看就行了，没有必要“惊动”大使。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先报给蒙古外交部的人员名单，只是二秘孙一先和两名翻译。

此时蒙古外交部已经下班，许大使决定打破常规，紧急约见额尔敦比列格。

额尔敦比列格晚上有外事活动，会见安排在20时。

许文益大使说：奉政府之命，失事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对此我们表示遗憾。对蒙古政府愿意提供飞机并指派领事司长陪我们到现场视察，表示感谢。我将亲自率有关人员前往现场，请蒙方给予帮助。

额尔敦比列格马上问：误入之说，是否是正式答复？

许文益大使说：可以这样认为。

这是否是最后答复？

为什么这样紧追不舍？许文益大使也警觉起来。他思索了一下，说这是我国政府在得到使馆的第一次报告后给我的指示，是正式答复，但我理解不是最后的答复。

额尔敦比列格问：失事飞机是从哪里到哪里？朝哪个方向飞？是怎样迷失的方向，误入我国领土的？

许文益大使坦率地说，目前为止无法答复。并反问：蒙古方面是否有飞机失事的进一步材料提供给我们？

额尔敦比列格也非常谨慎，说暂时没有。

其实这时候蒙方是明知故问，他们已经从256三叉戟内的航图上看到了标出的航线，知道飞机是从河北的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茨克。大概是他们想从中国大使嘴里套出更多的话来，或者看他知不知道更多的情况。

许文益大使希望明天上午动身，额尔敦比列格表示同意，让他们作好明天赴现场的准备。他对中方未能及时派人赶赴现场有点抱怨，说飞机失事两天了，等你们到现场大概要60多个小时了，天这么热，如果尸体变化太大，我希望你们不会提出更多的问题。

许文益大使马上将约见情况报告国内，翌日凌晨得到国内指示，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有困难，可拍照取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把遗骨运回国内。

这时候蒙古也有些“明白”了，先是迟迟不动身，然后紧急约见蒙古外交部副部长，中国大使要亲自出马，还想要回尸骨。看来外电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飞机的乘员中肯定有不一般的人物。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翻译王中远回忆：当时我们感觉到不是一般的事件。具体往谁身上想，谁也不敢想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林彪。林彪红得发紫，谁敢想林彪呢？后来知道，所有的人都很震惊，为什么震惊？都写进党章了，老人家还信得过谁呀？反过来，又想为什么？那么多高级领导人，出生入死，都打倒了，就这个写进党章的接班人跟老人家，究竟为什么？

现在轮到中方催促蒙方了。蒙古人似乎不那么着急了，借故一推再推。

孙一先回忆：9月15日早上8时，我们每半个小时就催问一次，询问什么时候到现场。

蒙方先说不知道，后来又说温都尔汗天气不好，不能接受飞机降落。其实天空非常晴朗，万里无云。拖到13时30分，蒙古外交部终于说，专机14时30分以后可以起飞。

原来从赤塔飞来的苏军直升机眼下正在坠机现场，不能让他们同中国人“撞车”。直到苏联人在现场“折腾”够了，中国人才被允许前往。后来才知道，苏联人9月14日去了一趟，9月15日又去了一趟，所以推迟了我们前往现场的时间。

蒙方也调整了“战略部署”，组织起一个庞大的视察班子，有边防内务军事务管理局处长桑加上校，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外交部二司专员古尔斯德，国防部副处长达木丁上校，边防内务管理局桑加上校等官员，还有航空、法律、法医等方面的专家，法律专家达希泽伯格，民航局专家云登少校，法医莫尤，卫生组组长桑加道尔吉大夫、卓乃大夫，肯特省检察长乌尔金道尔吉，以及报纸和蒙古通讯社的记者，以及电影摄制组等等，足有几十人，看来蒙方也是相当重视的。

一架伊尔-14飞机送中国大使等四人和蒙古的庞大班子去坠机现场，起飞时间14时45分，航程300公里。15时46分，到达温都尔汗“土机场”，飞行时间是61分钟。温都尔汗“土机场”确实简易，没有塔台，只有几间平房，几辆电台车。在草地上垫了层红粘土，就成了跑道。机场周围看起来非常平坦，没有土包，也没有高树。但是没有夜航设备，也就是说，到了夜间，和草原没有什么两样。

王中远回忆：我们在机场坐两辆嘎斯69，直奔坠机现场。

孙一先回忆：我们的汽车从温都尔汗出发，沿东北方向的沙土公路和克鲁伦河，行驶一个小时，转向东北，进入丘陵草原。一路上荒无人烟，除断续的馒头形土包外，还有二三十米高的石头山，汽车在丘陵间颠簸，常被高高弹起。向东北方向走了不到一小时，离开沙土公路，拐入正北一条草丛小路。这里很少有车辆通过，车胎压得枯草吱吱直响。小道左边是一连串较高的山丘，右边是一片向上的漫坡，坡顶是烧焦的草地。

下午近18时，大使许文益和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到达位于温都尔汗西北的坠机现场。

### 39、为什么叶群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256三叉戟坠机现场的九具遗体完整，大多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九具遗体分成非常明显的三堆，孙一先由北向南，把遗体编成1至9号，从各个角度拍下来。事后查明，机尾位置有三具遗体，1号是林彪座车司机杨振刚，2号林立果，3号刘沛丰。机头和机尾中间有四具遗体，4号特设师邵起良，5号林彪，6号机械师张延奎，7号主管机械师李平。这个位置似乎是在位于前舱的高级房间里。

机头烧成灰烬，驾驶舱的火势最猛，铝合金机壳都烧成了灰。位于机头位置的是8号叶群，她占据了副驾驶的位置，9号是飞行员潘景寅。潘景寅个子高大，体格魁梧，衣服基本烧光，只剩下裤腰碎布及一截腰带。两手掌及手指烧焦，鼻子和眼睛全部焦糊，头发烧焦。胸部左右锁骨上下，各有一大片皮肤绽裂，腹侧及两腿也烧焦了。潘景寅的姿势是仰面朝天，头朝向东，向着烧毁的机头。两臂上伸过头顶，手心朝前，两腿叉开，左腿挺直，右腿弯曲，脚跟蹬地，像是要挣扎着站起来，看来死前非常痛苦。王中远回忆：潘景寅烧得最重，奇怪的是与他在一起的叶群烧得最轻，虽然同在机头，叶群可以躲。而潘景寅操纵飞机，火再大也只能坚持。再一个潘景寅穿着军装，叶群不一定穿军装，里面至少不是的确良（70年代初军衣布料的确是的确良，遇火贴在身上燃烧，以后就换了布料）。所以叶群简直就像卧在那里熟睡，有的皮肤烧红了，

有的皮肤还没有改变颜色，还是白的，只不过烧光了衣服。叶群的头发基本完好，面部没有烧黑，只有额前略有焦糊，右颧骨连着眼角处，烧焦了银元大的一块。左嘴角被火烧歪，露出上排白牙。眉毛烧焦但没有脱落，眼睛半睁着，似乎向前看，两臂贴地斜伸，手心向上。左臂内侧绽裂酒杯大的伤口，肌肉外翻。估计这位“空中小姐”不年轻了，有30岁左右。

奇怪？为什么叶群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当然，256三叉戟上没有副驾驶，没有领航员、通信员，飞行员只有潘景寅一个人。正常情况下，三个机械师在飞机降落上帮不上忙，可是这是特殊情况啊。无论如何三个机械师总比叶群熟悉飞机，为什么潘景寅不叫三个机械师其中一个帮助他，而允许叶群在身边呢？

舒云分析：进入蒙古境内后，要与地面通话，或收听蒙方广播电台，确定飞机位置，语言就是一个大问题。九人中只有叶群精通俄语，蒙古当时驻有大批的苏联军队，蒙古人把俄语作为主要外语。如此，叶群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担负领航的重任。

孙一先回忆：机头灰烬前方80米处，烧焦的草地头，有一个从根部炸断的起落架，起落架上完好的轮胎，滚到南边200米处。它的后面朝北偏西的一条弧线上，散布着三堆尸体，机尾被远远甩到机头的右后方，靠近烧焦的草地边。看来机上人员和机尾都是在机身炸开的一瞬间甩开了的。但它们并不在一条直线上，令人有些不解。机尾离机头大约60米，最远一具尸体离机头大约50米，说明飞机爆炸的猛烈。从机头到机尾这条东南到西北的斜线上，与三堆尸体朝北偏西那条弧线，大约成30至40度的夹角，全是飞机上的残片。我们都没有处理过飞机爆炸，想象不出来现场是个什么情况。正常死亡见过，追悼会，死者经过化妆。去前有预案，我到医院要些手套，消毒品，带去也没用，我们没碰尸体。九具尸体并不像通常飞机失事那样，摔碎烧焦，而是有头有脚基本完整。大多是皮肉挫裂，骨骼折断，烧伤严重，但没有烧焦。由于燃烧时一氧化碳中毒，尸体皮下呈樱桃红色，亮晶晶如蜡人一般。好在蒙古9月天还比较凉，尸体没有太大变化，要是7、8月就……

引人注意的是遗体都没有戴手表，也没有穿鞋，这说明机上乘员都做好了迫降的准备。因为飞机迫降，冲撞扭曲得很厉害，乘客必须把身上的硬东西，如手表、钢笔、眼镜、手枪等取下来，以防冲撞时扎入人体。也不能穿鞋，紧急出口放下充气滑梯，穿鞋可能把充气滑梯扎破，或一旦被绊住要翻跟头。

可是，林彪一向害怕生人，那为什么在准备迫降时，林彪让素不相识的三位机械师保护他，而不让儿子林立果或司机杨振刚保护他呢？儿子和司机也同样身强力壮啊。当然也可以这样考虑，大型飞机在野外迫降非常危险。过去林彪一家都是尽量避免坐同一架飞机，这次三个人“挤”到了一起，又赶上危险的野外迫降，要死别全死，分在机舱的三个地方，没准还有哪位命大者能“侥幸”。可是林彪不让儿子保护，为什么也不让司机杨振刚保护？

4、5、6、7号遗体的分布是这样的，5号林彪脸朝东偏北。4号邵起良、6号张延奎、7号李平脸朝西，围成半圆，完全是保护5号林彪的姿势，6号张延奎胳膊前伸，手心内扣，像要抓住东西。他两腿斜叉，膝盖向上，脚心朝下，做蹬地状，像紧紧抱着什么。四具遗体中，只有4号邵起良是趴着，脸被摔烂，两腿叉开，脚心朝上，两臂下弯，右肘横伸，手心朝上，像背着什么。7号李平两臂横伸，小臂上擎，右手心向上，左手心下扣，也像是在保护什么。

机尾的三具遗体，刘沛丰和杨振刚外伤严重，林立果被夹在中间，稍好。与三位机械师保护林彪一样，刘沛丰和杨振刚也是在保护着林立果。

遗体分布证明机上没有发生搏斗，倒好像发生了大火。

（未完待续）

□ 选自舒云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y2222196>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